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美】路康乐 著 王 琴 刘润堂 译 李恭忠 审校

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美】路康乐 著 王 琴 刘润堂 译 李恭忠 审校

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美]路康乐著;
王琴,刘润堂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ISBN 978-7-300-12795-8

I. ①满…

II. ①路…②王…③刘…

III. ①政治制度-历史-中国-1861—1928

IV. ①D6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3138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满与汉

——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

[美]路康乐 著

王 琴 刘润堂 译

李恭忠 审校

Man yu H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开本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印 张 14.375 插页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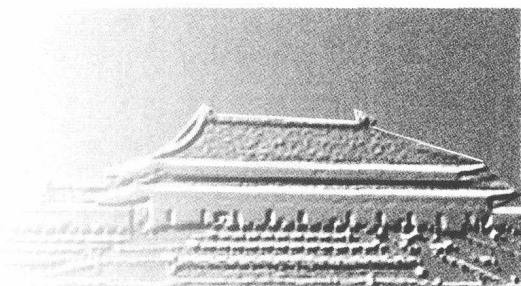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390 000

定 价 39.8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 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 世纪、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曾和世界各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而来，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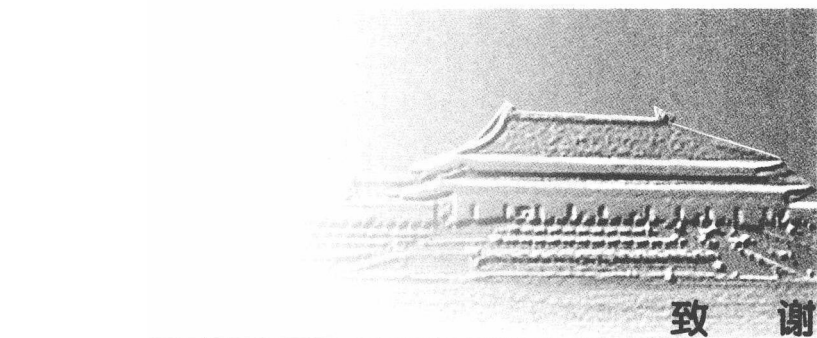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

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沛

2004年5月



致 谢

在进行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我背负了很多“人情债”，很高兴现在可以在这里一并致谢偿还。首先要感谢的是这项研究所涉及的档案馆和图书馆以及其中的管理图书档案的工作人员，它们包括：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以及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和东亚图书馆、匹兹堡大学希尔曼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和清史研究所资料室、北京大学图书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还有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佩里—卡斯塔纳达图书馆及其亚洲研究图书馆的凯文·林（Kevin Lin）和梅丽·贝林汉姆（Merry Burlingham）。尤其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及其前任所长戴逸先生，受他的邀请我于1982—1983年间在清史研究所做访问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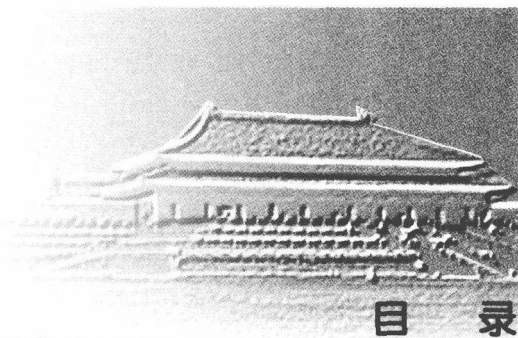
我也要感谢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大学研究所和匹兹堡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财力资助。

还有如下一些人热心阅读了书稿并对全书或书中的部分内容

提出了建议：斯蒂夫·麦金农（Steve Mackinnon），司徒琳（Lynn Struve），斯蒂夫·哈瑞（Steve Harrell），贝特斯·巴特里特（Betsy Bartlett）和帕蒂·斯多纳罕（Patty Stranahan），以及华盛顿大学出版社的一位匿名评审人。他们的批评，结合华盛顿大学出版社负责本书的编辑的意见，使得这部书稿更加简洁、紧凑，也更加准确，读者也能因之受益。本书的一些不足之处，当然由我承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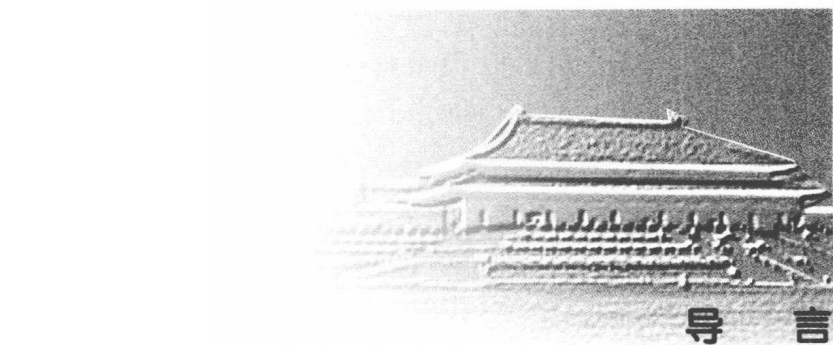
还有其他一些人为我提供了间接的帮助，其中包括：比尔·布雷斯特德（Bill Braisted），李文海，詹妮佛·罗兹（Jennifer Rhoads），苏赞尼·罗兹（Suzanne Kain Rhoads），阿特·罗森巴姆（Art Rosenbaum），戴维·斯特兰德（David Strand），已故孙毓棠，菲尔·伍德拉夫（Phil Woodruff），此外还有亚洲研究协会的西部和西南部会议的成员，他们年复一年，亲切和耐心地听我阐述这个难懂的课题。

但我最主要的帮助者和支持者是我的妻子帕蒂·斯多纳罕，她不仅对书稿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还给予了我不断的鼓励。没有她的热情与支持，完成这项研究还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导言	1
第一章 隔离与不平等	11
反满缘由	12
满人七宗罪	13
满人和旗人	17
隔离.....	32
.....不平等	39
两种人，两种文化	48
甲午战争之后的改革尝试	59
结语	63
第二章 慈禧太后和“特权制度”	89
政变中惊醒	90
满汉关系的变化	93
军事和警政改革	101

	教育改革	109
	政治改革和 1907 年政治风暴	114
	恩铭被刺及其反响	121
	结语	135
第三章	载沣和“满人权势”	153
	慈禧太后的最后岁月	154
	犹豫与退却	163
	军事和政治的集权化	174
	资政院之争	187
	结语	201
第四章	辛亥革命	218
	清廷的军事反应	219
	清廷的政治反应	224
	反满暴行	231
	南北和谈	250
	退位及其条件	259
	结语	271
第五章	辛亥之后的皇室和满人	290
	民国初年的皇室	291
	民国初年的满人	309
	1928 年后的皇室和满人	326
	结语	338
	结语	354
	参考文献	365
	索引	403



1898年12月底，光绪皇帝（1875—1908年在位）自上而下³推行宪政改革的百日维新遭到失败，梁启超对此极度失望。此后不久，他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把这个刊物作为探究清朝政治改革新思想的一个论坛。可能与人们期望的不同，在《清议报》创刊号的社论中，梁启超的建议不是要提高中国民众的社会意识水平，或者改变清廷的专制制度，而是要“平满汉之界”。^[1]

梁启超这种令人惊讶的观点基于一个社会进化论者对历史的理解。为了生存，种族之间必须互相竞争，“争种族”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驱动力。这种竞争不仅是世界各国间的普世法则，也发生在单独的国家中。在竞争中，只有“优种”生存下来，“劣种”不可避免被淘汰。当生命开始时，所有的种族都是平等的。为什么一些种族“发展”而变得优等，区别并淘汰了“劣等”种族呢？答案是“合种”。“数种相合而种之改良起焉，所合愈广，则其改良愈盛。”不融合的种族则面临着灭亡的危险。

梁启超把当时的中国与春秋时代的中国进行了一个对比。那时，周边的人民与中原的人民彼此视为异族，“互相猜而不相通，

无异于今之满汉也。自此以后，支那之所以渐进于文明，成为优种人者，则以诸种之相合也。为其相合，故能并存。”同时，大量其他种族因为没有互相融合而消失了。梁启超指出：

- 4 今犹有苗种、侗种、瑶种等与优种人错居而不相合。然其残喘殆亦不可以久矣。何也？不合则必争，争而必有一败，而胜败之数，恒视其优劣以为凭故也。今夫满人与汉人，孰为优种孰为劣种，不待知者而决矣。

诚然，在梁启超写作的时代，满人统治着汉人，但这是暂时的偏差。种族冲突不会在短时间内解决，可能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最终，智慧肯定会战胜野蛮。随着时间的推移，“优种”的汉人最终会战胜“劣种”的满人。

梁启超认为，在帝国主义的威胁下，满人统治者采取挽救危局的行动还不太迟，这不仅会影响满人，也影响着全亚洲。全球性的生存竞争演变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结果还很难预料。整个黄种人的命运取决于中国的存亡，因为中国的人口占了黄种人的70%~80%。然而，中国却处于满人统治之下，前途堪忧。“世界之进化愈甚，则恃力者愈弱，恃智者愈强。……即使以数百年前满州强悍之人种，生于今日，犹不能安然独立于竟智诸强国间也。况如今之满人，强悍之气已失，蒙昧之性未改，而欲免脔削渐灭之祸，其可得乎？”尽管种族竞争的关键在于“合种族”，但是“宰治支那者宁忍置全种数百兆人于死地，听其永永沉沦，永永糜烂，而不以易其一日之欢愉富贵”。

梁启超悲叹满人统治者的鼠目寸光。“徒认汉人为异种，为不利于己。而不知更有异种之大不利者过此万万也。”考虑到灾难性的后果，梁启超断定如果不通过平满汉之界来变革，那么等待满人的是汉人和白种人的双重威胁。

- 5 抑压政策行之既久，激力所发，遂生大动，全国志士，必将有美利坚独立之事，有法兰西、西班牙革命之举。彼时满人噬脐无及，固无论矣，即不然，守今日顽固之政体不及数年，必受分割。分割之际，会匪乘起，暴徒横行。政府之

威力，既不能行于地方，则民皆将任意报其所仇愤。其他吾不敢知，而各省驻防之满人，其无噍类也必矣。分割以后，则汉人满人虽同为奴隶，然汉人人数太多，才智不少，尚可谋联合以为恢复独立之事。满人则既寡且愚且弱，虽不遭报复于汉人，亦长为白种之牛马而已。且汉人之农者工者，其操作最勤，其价值甚廉，他日全地球力作之业，尚藉汉人为一转轮之钮，而南美洲、太平洋未开之地，皆赖汉人以垦之以实之，故汉土虽分割，而汉人仍可以有权力于世界之上，即受钳制，而终能以身存。若满人，则数百年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其全部五百万人，不能为士，不能为农，不能为工，不能为商，一旦分割，政权、财权、兵权三者，既归白种人之手，彼时欲求一饭之饱，一椽之安，可复得乎？然则满人所自以为得计者，正其自取灭亡之道，真所谓医渴而饮鸩者也。

梁启超的这篇短文非常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它有助于把社会进化论的概念和原理介绍给中国大众，而且这也是自从太平天国运动以来，第一篇理性批评清朝廷、满人和满汉关系的文章。此外，梁启超对五百万满人寄生虫式的生活方式（他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谴责，预示着共和革命者发动的反满宣传即将到来。梁启超关于满人“巨变”的预言，即如果朝廷拒绝以“平满汉之界”开始其他改革，就将会引起天下巨变，也在十余年后的辛亥革命中变成了现实。

本书包含了很多梁启超提出和涉及的问题。谁是满人，谁又是真正的汉人？那些清廷的反对者，尤其是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共和革命者，对满人有什么样的批评？这些批评在多大程度上令人信服？也就是说，在满人统治中国二百多年之后，满汉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方面有显著的差别？清廷如何应对这些批评呢？是否如梁启超所迫切愿望的那样，平了满汉之界吗？至于满汉关系，清廷到底是有所作为还是无所作为，清廷因何导致社会精英与之分道扬镳并激发了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期间和革命之

后，满人统治者和广大满人情况如何？一言以蔽之，在满汉关系这个棘手的、有争议的问题上，我们能从晚清朝廷适当或不当的处理方式上得到什么启示呢？本书同样关注族群关系和政治权力问题，它们与满汉问题有关，这在辛亥革命前十余年间尤其如此。

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在 20 世纪最后几十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早期的著作，尤其是中国历史学家的著作如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无一例外地集中关注革命派，特别是孙中山。^[2]此后，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学者的注意力开始从革命家（他们通常在国外进行许多密谋行动）转移到非革命的改革家（他们主要在国内活动）身上。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在关于湖北和湖南的研究中称其为“城市改革精英”，1976 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例如侯宜杰关于晚清立宪运动的历史研究）则将他们看做反对封建制度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3]辛亥革命不再被视为革命家组织的一系列武装反抗和民众起义的最终结果，而是改革精英们对清廷的不满和疏远不断增长的结果。然而，与上一代正统历史学家的研究相比，这些修正主义者的研究通常不关注清廷。因此，我们不清楚朝廷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才导致改革精英与之分道扬镳，致使他们放弃了对清廷而言至关重要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个王朝注定要灭亡。

关于清初统治者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相比之下，关于晚清的英文专著只有两本：芮玛丽（Mary Wright）关于同治中兴的研究和邝兆江（Luke Kwong）关于 1898 年百日维新时统治阶层间的钩心斗角的研究。^[4]尽管慈禧太后在晚清政治中居于重要地位，也统治了很长的时间，但还没有关于她的研究专著出版。当然，⁷有许多不太可靠的通俗传记（人们通常可以追溯到 1910 年布兰德（Bland）和埃德蒙·白克浩斯（Edmund Backhouse, 1872—1944）的作品）。^[5]这种忽视，特别是对清王朝最后十年的忽视，在中国学者当中也很普遍。

当然，主要原因在于 19 世纪中央权力的式微和伴随而来的（普遍认为）清廷的软弱无能。因此，关于清末十年的研究，焦点

通常不是集中在慈禧太后或者其他朝臣如庆亲王奕劻身上，而是集中在表面上握有重权的封疆大吏，如张之洞和袁世凯（1859—1916）身上。关于他们，裴士丹（Daniel Bays）、拉尔夫·鲍威尔（Ralph Powell）、陈志让（Jerome Ch'en）、麦金农（Stephen Mackinnon）等人都有相关著作予以论述。^[6]历史学家分析晚清朝廷时，其重点通常集中于这样一个或者两个主题上：慈禧太后开始尝试改变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来的地方分权趋势；慈禧太后之后，因为年轻而缺乏经验的继任者载沣的无能，他短暂的摄政期在革命中终结。1909年1月，这两个主题汇集成一点，当时载沣突然地、也可能是愚蠢地剥夺了袁世凯的全部政治和军事职位。对于自己的突然被解职，袁世凯既没有辩解也没有反抗，他的解职也解释了一个疑问：直至清朝灭亡前三年，朝廷可能并不像通常描述的那样软弱无能。

本书考察了慈禧太后和载沣如何处理梁启超在1898年提出、随后又成为革命派宣传攻势之靶子的满汉关系问题，从而为晚清朝廷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特别是1907年夏天满人巡抚恩铭的被暗杀，促使慈禧太后全面审视满汉关系问题。她（后来是载沣）试图通过缩小少数满人与多数汉人之间的大量差异来平息革命者的抨击。然而，他们同时还进行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强化皇权”的努力，这又大大削弱了他们改善满汉关系的成就。朝廷强化皇权的长期努力始于1861年恭亲王奕訢被任命为军机处大臣——迄今为止，历史学家往往因为关注当时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而忽略了这一点——最后在1911年5月，以备受指责的“皇族内阁”的出现而达到顶峰。这也是清廷方面令改革精英极度失望的关键决策之一，导致了他们在5个月后革命爆发时放弃了对朝廷的支持。本书也涉及了清廷对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反应，以及清廷在为1912年2月清帝退位协议铺平道路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最后，本书讨论了革命之后皇室的命运，包括“末代皇帝”在1924年被逐出紫禁城，以及1928年清朝皇陵被人破坏却没有遭到惩处等问题。

关于广大满民众，他们与汉人的关系是本书的另一个主题。

满人的历史和身份与八旗制度紧紧缠绕在一起。从清太祖努尔哈赤（Nurhaci）开始，旗人作为一种军事力量，在 1644 年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随后又作为职业军人驻防于全国各地。八旗制度创建之初的主要成员是满洲东部和北部的女真人（Jurchen），努尔哈赤的儿子和继任者皇太极（Hong Taiji）把女真人更名为“满洲”，不久以后本地区的其他民族成员，主要是蒙古和汉又加入了。然而，旗人不仅包括八旗士兵，也包括他们所有的男女老幼家属，他们统统被称为“旗人”。在八旗制度中，旗人资格是世袭的，旗人作为一个整体与其他大量人口区分开来，那些非旗人被称为“民”。旗人与满人的关系可能令人困惑。要通过英语把几个不同的汉语词汇——尤其是满洲、满人、满族——区别开来，这是很费劲的，因为这几个词汇都可以毫无争议地翻译成英语的“Manchu”。本书认为，旗人（皇太极的满洲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与义和团运动之后十年内的满人是同义的（梁启超在 1898 年称之为“满人”），本书也认为他们为满族的“族性”或者满族的“族群”确立了基础，在 20 世纪 80 年代，满族在人口数上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大少数民族（仅次于壮族）。本书展示了满人是如何从世袭的军事阶层——他们在清代主要是作为八旗制度的成员——转变成了今天的民族。相应的，如果满人被界定为旗人，那么汉人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非旗人的“民”。

虽然满人作为“旗人”在关于清代前期的著作中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但他们在 19 世纪早期的历史中却似乎消失了。^[7]直到现在，也只有三本关于晚清满人的英语著作。一本是罗伯特·李（Robert Lee）的考察了汉人移民对满人家乡满洲的影响的著作；另一本是戴福士（Roger Des Forges）关于蒙古旗人锡良的政治传记；第三本是柯娇燕（Pamela Crossley）关于一个驻防杭州的满洲旗人家庭的历史研究著作（从 18 世纪 90 年代到清朝灭亡）。^[8]

9 目前，研究晚清八旗制度的中文著作数量众多，但与研究清前期八旗制度的著作相比，也不过是沧海之一粟。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是陈一石、金启琮、汪宗猷和郑川水，他们的著作在本项研究